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 降边嘉措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2

1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降边嘉措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此项
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6 号

《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降边嘉措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0.875 字数：267 千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 7-81015-395-1/I·45

定价：(平装) 7.50 元
(精装) 9.80 元

000545

前 言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极为丰富，其中史诗尤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历史文化宝库中一串别具特色的明珠。我国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尔》（《格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闻名于世。它们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相媲美。此外，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广为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各民族民间同样也流传着富有神话色彩的各种原始性史诗和一批英雄史诗。

史诗体裁大抵是产生于史前文化阶段，它经过了悠久的民间口头流传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史诗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演变。史诗是人类社会现实的折射性反映，在长期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阶级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映现。史诗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在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

印度史诗、古希腊史诗和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两千年前就已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史诗，退出民间艺人的演唱舞台，作为一种文艺样式被人民群众淡忘了。因此，研究印欧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少问题难以解释。可是，在我国南北各地存在

着许多天才的民间艺人，他们熟记各民族数以百计的史诗。这种罕见的活的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继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状况自然也引起了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史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们把对中国史诗的研究著作看作是解开欧洲史诗之谜的钥匙，并通过它探讨有关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等问题。

我国各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鉴于目前尚未出版过一套系统的史诗研究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史诗一章的空白尚未得以填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发起和承担了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的撰写任务。根据这一课题计划的要求，我们要完成《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和南方原始性史诗和史诗理论研究著作各一部。现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中的一部。

我们课题组的全体人员为了很好地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积极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量掌握全面资料，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撰写者水平所限，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仁钦道尔吉 教授

1990年3月30日

绪 论

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到辽阔富饶的蒙古草原，从长江黄河源头，到美丽的贝加尔湖畔，从昆仑山下到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到处都流传着一部不朽的诗篇，她的名字叫《格萨尔》。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后来流传到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地区。她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精深博大，流传广泛，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她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首宏伟的诗篇，世代相传，从遥远的古代吟诵至今，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她象喜马拉雅山那样宏伟雄奇，象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永葆艺术青春。

《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本身就是一首诗篇，一首悲壮苍凉的诗篇，一首大气磅礴的诗篇，一首洋溢着蓬勃生机、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诗篇，一首孕育着创造精神、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篇。

从她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大，有一、两千年之久；从藏族的社会形态来看，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经历奴隶主专政的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依然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广泛传唱，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表现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历史上藏族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都对《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产生过影响，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都在这部宏伟的史诗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使她日趋丰富和完善。反过来讲，《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确立了地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藏族文化史上没有第二部著作，能象《格萨尔》那样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是一部真正的“奇书”。

千百年来，《格萨尔》能在世界屋脊之上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精神。《格萨尔》有着独特的传承方式。一个生长在偏僻山村和牧区，目不识丁的农民或牧民，为什么能讲述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史诗故事，吟诵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诗行？若将他们的唱词全部记录整理成文，有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那是厚厚的几十部书。他们是怎么学唱，怎么记忆的？这样的艺术天赋，令人惊叹。惊叹之余，也使人感到疑惑不解。这种记忆之谜，至今我们没有能够做出科学的、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把那些能吟诵几十部、数十万诗行的优秀民间艺人，称之为“奇人”。这些“奇人”究竟奇在什么地方，怎样解开他们记忆之谜，成了史诗研究领域里的“斯芬克司之谜”，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宏伟的史诗，过去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至今没有能够反映史诗全貌的整理本。众多的研究《格萨尔》的专家学者，如同瞎子摸象，只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探索，而不能全方位地从整体上去认识她，把握她，研

究她。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从五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搜集整理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它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动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和实际问题，促使我们去深入探讨。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格萨尔》又长期遭受僧侣贵族的排斥和压制，她的传播受到限制，吟诵史诗的民间艺人备受歧视和迫害(1)。人民群众的热爱与僧侣贵族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格萨尔》这部壮丽的诗篇，竟然不能登上藏族艺术的殿堂。按照藏族文化传统的分类法，在所谓“大五明”和“小五明”里(2)，都不包括《格萨尔》这样的史诗。他们把僧侣贵族文化抬到至尊至高的地位，而忽视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把《格萨尔》说唱艺人视为乞丐，把这部伟大的史诗称作“乞丐的喧嚣”。还说什么“唱了《格萨尔》，必定遭祸殃”。他们认为，说唱《格萨尔》，违背了宗教教义，因此会受到天神的惩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至今对她的价值认识不清，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学术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搜集整理工作目前正在艰难地进行，翻译、出版工作更是千折百回，千辛万苦。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尚待深化。很多人只知道有《格萨尔》这么一部史诗，但无从了解她的内容，知其名，不知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项宏伟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这种遭遇，同其它藏族典籍文献与文化事业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格萨尔》的不幸，是广大《格萨尔》工作者的不幸，是藏族文化事

业的不幸，也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事业的不幸。这种强烈的反差，在藏族文化史上也可称为一个“奇事”。

但是，广大的《格萨尔》工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文化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受到什么浪潮的冲击，总是以执着的追求，坚忍不拔的毅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艰苦努力，开拓前进，在荆棘丛中踏出一条坦途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成绩。我们更相信有辉煌的明天。

奇书、奇人、奇事，构成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独特的遭遇和命运。正是有感于斯，我曾写过一本书：《〈格萨尔〉的历史命运》。

本书的写作目的，正如书名所揭示的，试图从更宽广的视野，论述《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要阐述《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藏族文化？

文化一词所蕴含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和深广，以至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大学者几乎都对“文化”有自己的理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解释和阐述。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的开篇即发出这样的感叹：

“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

不容易也得去做，马氏作为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写作《文化论》的目的，就是要回答“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他指出：

“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充分说明，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含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

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集团，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3)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因素之一。他们认为：

“文化是指人类的主要行为特征，是人类群体所共有和习尚的行为、思维、感情和交流的选择性模式。人类是一种进化了的特别动物，是文化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也只有人才具有使用和发展文化的能力，因此，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因素之一。”

(4)

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按照人类学的一般定义，文化一词指的是特定的或社会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因此，某个社会集团的语言、一般知识、宗教信仰、食物偏好、音乐、劳动习惯和禁忌等便构成了它的文化。”(5)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探索史诗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是有启迪作用的。“文化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不同，他试图从比较完整的角度去分析文化人类学的主题，这种角度既注意到文化的生物基础，又包括文化积累发展的过程，即人类从生涯开端到当今的全部运动的所有人类的社会行为，使读者对文化存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获得一个整体性的认识。”(6)

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作了这样的定义：

“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格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

美国人类学家阿德林·林顿作了更为简结的概括：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中的人从长辈中学到又传给下辈的众多的行为。”(8)

阿德林·林顿在《文化树》这部论述世界文化史的著作中，在

横向的空间平面上，将人类文化分为若干大的文化区。他认为，各文化区在文明兴起的时间和发达程度上千差万别，各文化区自有其显著的特色，亦有其共同的模式。这些文化区包括：两河流域文化区、埃及文化区、希腊罗马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国文化区。阿德林·林顿认为：这些文化区独立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又不是封闭的板块，而是相互影响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渗透和流动的文化复合体。正如书名所表明的，作者把人类文化比作一棵热带大榕树。他认为：“这棵大树扎根在史前文化悠远的土壤之中，它的不定根和气生根落地之后，长成了许多附生的树干；它枝杈横生相互绞结；它最终长成一片盘根错节、枝杈交叠的丛林。换言之，人类的文化源头在人类祖先的亚人动物的进化之中；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并行发展的；各种文明是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人类文化的演进不象一般进化论者所描绘的那种进化树，不是只有一条主根、一条主根的进化树，而是附生根众多、枝干绞结的大榕树。”（9）

阿德林·林顿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研究史诗，至少有这样两个启示：

第一，在他所划分的几大文化区，即几个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除了埃及文化区，都伴随着一部伟大的史诗，同那里的文明一起生长，一起发展，并成为那一地区文明的代表和象征。两河流域孕育了《吉尔伽美什》；希腊罗马文明产生了荷马史诗；印度文明是《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摇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以汉儒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各个兄弟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珍贵的文化财富。此外，还有极为丰富的神话传说。黄河与长江孕育了源远流长、绵延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黄河、长江的发源地，辽阔壮丽的雪域之邦，产生了《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她是中华文化最初的成果之一。

第二，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并行发展的，而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条主根、一条主根的进化树，而是附生根众多、枝干绞结的大榕树。更不是象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以一个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散射式发展。就是说，无论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还是一个文化区、文明区的发展来看，各个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者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蛮族文化对古老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影响；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文明程度迥异的文化的影晌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低文化也可以向高文化逆向流动。这种观点可以给人以启迪，对我们认识和评价包括《格萨尔》在内的各民族的史诗在各该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进而认识各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都是有益处的。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有其自身生命和自身规律的自成一格的系统，其功能在于使人类适应自然界，以保证种的生存和延续。他指出：“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它穿越历史，从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最后，人们终于理解到，决定文化的因素就存在于文化流程自身之中；语言、习俗、信仰、工具和礼仪，都是前导或伴生的文化要素和文化过程的产物。”（10）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11）

文化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又是社会构成的参数。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总是密切相连的，有人常常笼统地称之为社会文化。在

社会文化这个系统中，宗教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宗教是解析和阐释文化要义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对藏族这样一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全民信教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本书用较大的篇幅探索了藏族社会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这里不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藏传佛教，还涉及藏族先民的自然崇拜，灵魂观念，以及在本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苯教文化。这看起来同《格萨尔》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和功能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它不仅建构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还构成各种独特的社会和制度。因此，探索藏族社会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演进的历史进程，分析藏民族信仰心理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对于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格萨尔》产生、演变、发展和流传至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无裨益。

从广义上讲，人类智慧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包括科学发明、技术制造、社会制度、国家政权等各个方面。本书不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本书探讨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的关系，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即藏族的历史、宗教、语言、民俗、民间文化等方面，而且始终紧紧围绕《格萨尔》的产生、发展及其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影响与地位这一主题。

(1) 这是就总体上讲的。个别有文化、思想比较开明的僧侣贵族和封建

领主，也有喜欢听《格萨尔》故事的，甚至在家里长期收养说唱艺人，并组织人记录成书。部分手抄本就是这么产生的。

(2) 大五明：工艺学、医学、声律学、正理学（即因明学）、佛学。

小五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3)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4) (5) (6) C·恩伯、M·恩伯著：《文化的变异》第 5 页、第 8 页、第 5—6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7)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 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8) 阿德林·林顿：《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第 1 页，重庆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9) 见《文化树》译者序。

(10)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第 2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11) 转引自《文化的变异》第 29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目 录

绪 论

- 第一章 历史的轨迹…………… (1)
- 自然崇拜…………… (2)
- 苯教文化…………… (12)
- 佛教文化…………… (30)
- 第二章 三元汇合的结构形态…………… (46)
- 割不断的历史渊源…………… (46)
- 两种民族文化…………… (51)
- 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64)
- 第三章 一条流动的大河…………… (76)
- 历史的回声…………… (76)
- 无字的丰碑…………… (81)
- 记载“民族记忆”的书…………… (93)
- 第四章 山神·战神·图腾崇拜…………… (102)
- 山神崇拜…………… (104)
- 战神崇拜…………… (112)
- 图腾崇拜…………… (116)
- 第五章 灵魂外寄与灵魂转世…………… (125)
- 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125)

2754/21

灵魂外寄	(128)
灵魂转世	(141)
第六章 梦·占卜·巫术	(151)
关于梦	(151)
关于占卜	(164)
关于巫术	(180)
第七章 部落联盟与部落意识	(191)
部落社会的组织结构	(191)
部落联盟与部落战争	(200)
部落社会与部落意识	(211)
第八章 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	(218)
两种文化的撞击	(218)
灾难性的后果	(238)
佛、苯之争对《格萨尔》的影响	(244)
第九章 格萨尔——民族之神	(258)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之神	(258)
雪域文化铸造的民族之神	(263)
寄托着民族的希望	(275)
第十章 人民诗人——《格萨尔》说唱家	(282)
艺人的分布与艺人的类型	(283)
说唱艺人的记忆之谜	(293)
说唱艺人的灵魂观和创作观	(311)
艺人群的发现在认识论上的重大意义	(318)
后 记	(325)

第一章 历史的轨迹

要了解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就得弄清它的起源。这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列宁在《论国家》这部著作中，在谈到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国家问题时，曾经指出：

“要最科学地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

这里列宁特别强调要了解研究对象“基本的历史联系”，而且认为这是“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文化人类学也十分注重文化积累发展的过程，“使读者对文化存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获得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要探索《格萨尔》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分析她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必须对她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藏族文化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一番考察，哪怕是最肤浅、最概括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格萨尔》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的历史联系”。

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其他各个民族一样，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的先民就在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也在不断地认识主观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